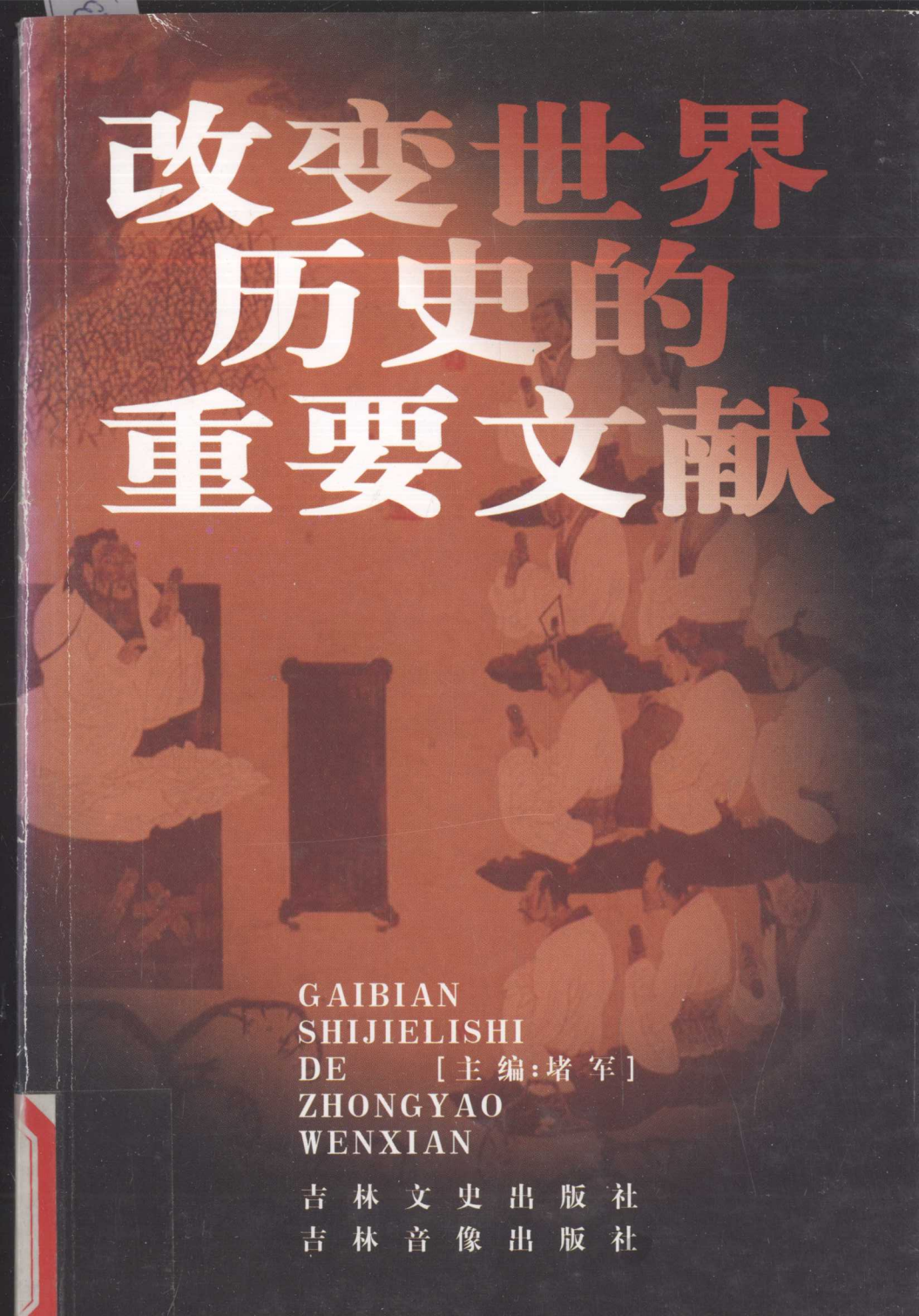


改变世界 历史的 重要文献



GAIBIAN
SHIJIELISHI
DE [主 编: 堵 军]
ZHONGYAO
WENXIAN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吉 林 音 像 出 版 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 重要文献

主编·堵军

〈十〉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第一章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 社会发展的理论	(1657)
第二章	从商品到服务：不断变化的经济形态	(1715)
第三章	知识和技术诸方面： 后工业社会中新的阶级结构	(1753)

第一章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社会发展的理论

社会学家始终要设法当预言家——要是不当预言家，也是观察家。从1850年到1860年，当马克思每天上午坐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的時候，他认为从每一点模糊的暴乱声中或者从每一次商业周期下降的吱吱嘎嘎声中都可以听到革命的轰鸣和社会的突然转变。在这方面，马克思所迫切等待的，正是社会学在19世纪初兴起以来所关切的中心：那就是，在历史的天空中寻找能推翻现有社会秩序的“新阶级”的预兆。昂利·圣西门（奥古斯特·孔德的老师，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在1816年开始不定期出版《工业》杂志（“工业主义”一词就是在那里流行起来的）并在其中描绘未来社会，他在那时候就提出了这个探索。圣西门说，过去的社会是军事社会，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牧师、武士和封建主——“寄生虫”和财富的消费者。他说，治理新社会的则将是生产者——工程师和企业家，时代的“新秀们”。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形象。托克维尔在1840年的著作中对于他所见到的在现代社会中兴起的新的群众性民主，作了有关其可能结果的如下预测：

“一大批类似的、同等的人们都在力求为自己取得一些小小的、庸俗的满足。……在他们上头，有一个巨大的监护势力（国家），它为他们提供安全，考虑和供应他们的需求，指导他们的工业，调节财产的传宗接代并分配他们的继承权；剩下的就是使他们省心和免除生活的烦恼。”

30年以后，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尔卡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他观察德国社会的转变时说：

“军事机器……必然成为存在的模式……军政府必将转为‘工业式的’。大工厂里的大批人将生活在某种确定的、受到监督的贫困之下，每个人要穿上划一的制服，每天的作息以鼓声为号；按逻辑说未来就是这样的。”

在布尔卡特以后 50 年，索尔斯坦·维布伦又回到了圣西门的主题上来。他说，20 世纪的革命只能是一次“工业变革”，而如果美国发生革命（之所以强调“如果”，因为他对那种前景是很抱怀疑的），不会像苏俄那样（那是一个松散、落后的工业地区）由一个少数派政党来领导，也不会由工会（它只“关心饭碗”）来领导，而是由工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参谋长”生产工程师来领导的。他在《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一书中写道：“革命战略的这些主要方针是技术组织和工业管理的方针；工业工程的重要方针；它适应该组织关注于构成任何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的高度技术工业体系。”

这些力求描绘出新时代轮廓的不平常之处，是每一点都带有一丝真理，而且带有复杂的阴影而歪曲了预测。布尔卡特在预测“按逻辑说”未来的情况以后，立即讽刺性地补充说：“我了解不少历史，知道事物并非总是按逻辑发展的。”

我们的时代也不乏社会学观察家。过去的习惯具有强制力，即使以往的经验促人谨慎，但社会变化的感觉记忆犹新而社会结构的变化扣人心弦，因此任何主张的社会学理论家都对社会面貌抱有不同的概念并对未来的社会设立一套路标。

对于新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预测都是标准的：它们将成为工业化的、现代化的和西方化的国家，即使不太清楚它们是否成为共产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国家；被军事或政治权势分子改造社会呢，还是被群众把社会复兴。一位怀疑论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曾说“过渡性社会”的范畴可能在社会科学中成为一个永久的范畴。然而对第三世界来说，虽然发展可能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是却有一种历史转折点和新时代开端的感觉。

可是对先进工业社会而言，情况就较不明朗了。每个观察家都感到一个时代的终了（天哪，我们经历了多少次“危机”呀！），但对于前景可能如何却毫无一致意见。正如弗兰克·克

莫德指出的，这种启示录式的共同看法：“时代终了感”，正是当代特有的文学形象。

在社会学里，这种踏步不前感、生活在空白间歇期之感，最突出地表现在广泛使用“后”一词（表达“以后时期”的一个前缀词，因此是自相矛盾的）作为一种综合形式来说明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里。他说，在工业社会里，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是权威，随着生产资料法律所有权的缩小，结果在经济与政治秩序之间就发生分裂。他说，旧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劳资矛盾已经“在体制上被隔离”，因此不会从工作岗位带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以工业本身而言，劳资矛盾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在体制上被隔离，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就是说：人们的职业地位已经失去对产业工人社会人格的全面塑造力，而只能决定其社会行为的有限部分。”）在各个领域内，权威则是有自主力的：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政治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再是等同的了；换句话说，原则上有了两个独立的斗争战线。在企业以外，经理可能只是一个公民，而工人却是一名国会议员；他们的劳资阶级地位不再决定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地位。”

简言之，这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手段不再决定对社会的控制、权力或特权。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虽然仍然产生其自身的矛盾斗争，却不再继续或普遍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中心。那么，构成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是谁呢？达伦多夫写道，“我们必须在受权向行政管理人员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中间寻找那些构成官僚阶层地位的统治阶级。”但是，虽然可能有企业管理或资本主义的权势分子，真正的权力却是在政府权势分子手中。（“有必要首先想到这一权势阶层而决不能无视它在国家权威结构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矛盾斗争首先是在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变革是由政府权势分子推行或阻止的；而企业管理或资本主义的权势分子设法在他们领地之外行使权力时，他们总得设法影响政府权势分子才能这样做。

谁是政府权势分子呢？国家的行政官员，内阁的政府部长，法官。但是既然政府代表各种利益，所以这些权势分子有着“幕后集团”。

“所以，抽象说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阶级是国家的行政官员、居国家之首的政府权势分子和政府权势分子所代表的那些受益集团。这样坚持把政府权势分子视为统治阶级的核心，一定会使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考虑问题或者比较一般说来以传统的阶级概念考虑问题的人们感到吃惊……”

正如达伦多夫所写的，“如果这听来奇怪……那是因为现实就是奇怪的。”

乔治·利希特海姆认为，“现实情况是：当前的工业社会日益成为‘后资产阶级’社会，因此，随着私人企业家成为体制的枢纽，19世纪的阶级结构就日渐解体。因而出现这种很大地影响当前政治思想的不确定状况。”利希特海姆说，原因在于社会福利立法和收入再分配都是约束市场经济活动的“社会化进程的不同方面”，而与此同时，公共所有制的发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平衡。“最不会发生的情况是工业社会保持‘资产阶级的’面貌。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如果一方日渐消亡，另一方也不复存在，由于同样原因：现代工业社会并不要求任何一方来使社会运转。”

阿米泰·艾特齐奥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后现代”时代。他在他的《积极的社会》一书中一开始就奇特地宣称：“现代时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讯、知识与能源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告终。”但是遗憾的是，在该书长达670页的正文、注释和词汇中没有一处讨论到通讯、知识和能源技术或者具体谈到“后现代社会”到底是怎样的。到头来我们不得不回到该书前言中开头几行所谈的意图：

“现代时期的一个中心特点是生产技术的效能继续提高，这对于它们所要服务的价值观的首要地位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后现代时期的开始可以定在1945年，在这一时期里，或者是技术的发展对这些价值观的地位形成更大的威胁，或者是

这些价值观重申自身规范的优先地位。哪一种可能性占上风，决定于社会到底是它所创造的工具的仆人还是主人。”

所以，后现代时期或者后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定义，而只是一个问题。

肯尼思·博尔丁认为我们处在后文明时代的开始。正如博尔丁先生所指出的，由于文明包含着有利的涵义而后文明可能使人感到不利的涵义，所以人们可能使用“技术社会或发达社会”的字眼。但是博尔丁先生认为这个新时期的不同特点是认识到知识领域（泰尔哈德语）是社会的社会方向以及社会自觉性战胜个人自觉性的成就的前提。因此，博尔丁这个名称的要害是强调在这个新兴的社会进化或精神进化的时期中社会指导的可能性，而不是强调过去的适应性生物进化或社会进化。

萨姆·比尔在他的《集体主义时代的英国政治》一书1969年版后记中谈到一种“后集体主义”政治。他感到被政党所划分的、功能主义的、以福利国家为方向的英国政治的集体主义模式可能行将结束。后集体主义倾向是“对于政府和社会合理化日益扩大和加强的一种反应。”即使它不会在政治方式上产生根本的决裂，它却可能形成英格兰政体的调整。（第426页）

因此情况就是这样。往常伟大的文字修饰语总是一个“超”字：超悲剧，超文化，超社会。但是我们似乎已经用尽超字了，因此今天社会学的修饰语是“后”字：神学家西德尼·E·阿尔斯特罗姆描述60年代美国的宗教状况是“后清教徒式、后新教徒式和后基督徒式的”。刘易斯·福伊尔为他的《马克思与知识分子》一书起的副标题是《后意识形态论文集》。约翰·伦纳德在《纽约时报》上谈到“后文学文化”是麦克卢汉时代所开创的。社会学家S. N·艾森斯塔德特认为新的国家已经成为“后传统”社会，因为它们虽然不再受到过去的规范所约束并自觉地寻求变革，它们却生活在一个暂时停顿的世界之中，与现代的西方社会很少相近。早些时候，罗德里克·塞顿贝格在预言理性主义的胜利时曾经描绘一种“后历史人类”，他说我们从史前（其中，本能胜过理智）经过历史的过渡时期发展到后历史时期（其中，理智胜过本能），正如查拉图士特拉（即袄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译注）所说的，

悬在深渊上空绳索上的人类，正是过去的动物与未来的超人之间的过渡。在这批清单的最后（只是由于谦卑），我们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主题。

马克思的两大图式

我们都是大师们的追随者。爱德华·希尔斯最近的评论是很正确的：

“巨大的困难之一是我们无法超越 19 世纪与 20 世纪社会学伟人们所定下的主题的变体。‘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圣西门、孔德、托克维尔和韦伯提供我们的想象的混合，这证明我们禁锢在一个定义含糊的圈子里，这个圈子比它应有情况更加难以渗透。”

很奇怪，希尔斯教授没有提到的一个人物是马克思，或许因为我们都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圣西门把历史各阶段描述为有机社会和关键社会的交替盘旋（这预示了索洛金抱有成见的、激动的心理），而孔德则看到社会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到科学阶段的理性进展。如果不问理论，则两者都很深邃，可是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兴趣根源必然是马克思。马克思把社会变革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体制（而不是心理状态，虽然他对思想过于傲慢或者把思想作为附带现象），他以命定的方式来说明社会变革，设法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来揭示那种命定主义的根源。我们很少会说我们预测的社会变革来自苍天，或者完全来自人们的想象设计。即使这些变革最初以思想出现时，它们也必须体现在体制之中；说明社会变革就是说明变革在中轴体制中的性质。那么，如果人们必须指明某种命定主义，他就必须再次同马克思的鬼魂妥协。如果我们设法说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预言开始。但是，我们这样做，却面临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可以设法表明，这种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是一个图式，而是有两个图式，而大部分社会发展理论正是对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图式作出反应的。

在《资本论》中（特别是第 1 卷第 33 章，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勾画了他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图式：他说，新社会的结构，即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已得到充分发育；这种新结构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化性质

同“资本的垄断”所产生的“生产方式的桎梏”之间越来越大的矛盾；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一个数量日益缩小的资本大王以及一个稳步增长的工人阶级；新社会的性质同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最后“外壳就炸毁了”，社会主义世界来临了。这个比喻是生物学方式的，过程是内在的，发展轨道是单边的。

然而，事物当然并不这样发展。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呼吁具有特殊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运动却只是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最为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却和《资本论》第1卷的概述中所设想的情况大不一样。可是马克思在其后时期里，特别是《资本论》第3卷所表达的几节中确实准确地看到了已经来临的事物的形态。马克思两种不同图式之间的一系列不同，正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先进工业社会的社会发展分析的真正出发点。

我们先从第一套图式谈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程的分析，最初在两方面的生产：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农业。可是，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大，土地与资本之间的不同、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不同都消失了。这两个阶级的溶合就在社会上只留下两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以及无产阶级。马克思说，我们的设想是资本主义生产继续扩展而吸收整个社会；因而只存在这两大阶级（第2卷）。所有第三种人都被排除了。正如亚伯拉姆·哈里斯所写的：

“第三种人的名称是马克思用来指两类不同而多少有关的人们。第一类人包括如小农、独立手工业者以及其他所有在资本主义进程本身以外活动的、旧生产方式的遗留者。第二类人包括两种：（1）牧师、店主、律师、官员、教授、艺术家、教员、医生和士兵，他们生存于资本主义进程的基础之上，但没有参加这一进程；（2）商人、中间人、投机者、商业劳动者（白领职员）、经理、工头以及其他所有‘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的官员。”

为什么这些第三种人要被排除在外呢？马克思认为，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在资本主义进程之外的，虽然他们带有资

本主义进程的特点。(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他们是资本家;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他们是工资收入者。)无论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将趋于消失。艺术家、医生、教授之类都是“非生产者”。劳动如能以剩余产品和新资本形式的新价值来取代资本家提供的旧价值,那么它就成为生产性的。在旅馆里工作的厨师或侍者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为旅馆老板创造了利润;如果他们在私人家里服役,即使给他们支付工资,他们也是非生产性的。非生产性劳工从参加生产的两大阶级的支出中取得收入。如果劳资关系扩展到医疗、娱乐和教育中去,那么医生、艺术家和教授就成了工资收入者,就是“生产性的”了。

在这一切中,马克思设想了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的模式。正如马克思写道:

“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195—196页)

因此,这种“纯粹形式”的设想是马克思分析中的基本之点它设想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或者被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所消灭,或者从属于它。不论资本主义进程是从商品的观点来考虑还是从收入分配的观点来考虑,“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地租、利息等形式……”。(《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370页)

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内部,有一个双重的过程,那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的不断积累造成了资本的集中,以及它集中到“强大工业企业”的手中,主要牺牲了“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687页)另一方面,同可变资本或工人相比,多得不相称地使用了不变资本。这就通过取代工人而产生了相

对“过剩人口”，使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274页）从这一点，就出现了经济启示录的强烈感情展现：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随着那些……资本巨头不断减少，……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一段著名的话中认为这些结果将以铁一般的必然性发生作用，认为最早发生这种情况的英国的命运预示着所有其他国家的命运。马克思写道：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过程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8页，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应当强调，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图式并不是一种

经验性描述，而是从他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式中得来的。然而“纯粹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等到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大规模投资银行体系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已经开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曾经有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旧”中产阶级的话，人们对于正在出现的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等的“新”中产阶级又要说些什么呢。这就是第二种图式的基础。马克思以格外敏锐的目光来观察这一现象。

在这个社会里发生了三大重要的结构变化。第一，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马克思评论道：“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686页）

第二个变化是股份公司所造成的革命，其结果就是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并产生了一个新类型的职业（如果不说是一个新阶级的话），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社会的“指挥劳动”。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434—435页。）

最后，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工作的扩大。

“……很清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业活动将会增加；……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动。生产规模越扩展，产业资本的商业活动……也就越增加，虽然决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业雇佣工人就成为必要了，他们组成真正的事务所。”（《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中文版第 334 页）

然而，虽然这三大结构变化似乎大大修改或反对了阶级分化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 1 卷的末尾是提得很强烈的。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马克思认为基本的社会学倾向、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财产社会化性质的扩展会迫使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就银行制度而言，他不认为信用的体制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根源，而认为那会加速危机。

“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由于这一点。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中文版第 686 页）

至于管理的职能，他认为这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同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如果不能说更多，也是同等的。马克思说，这种管理的职能“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而“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这无非就是说，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中文版第 435 页）“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不必是乐器的所有者。”“合作工厂证明资本家就像职员一样地多余。”

事实上，不久以后，马克思在一段惊人的分析中写到经理的产生是把利润转变为“社会财产”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有了经理（“熟练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资本家就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经理脱离了自身的劳动，而利润就有了社会性。马克思写道：

“……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

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部，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494页。）

至于白领工人，马克思预见到这种职员的数量会扩大，但是他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因为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和公共教育的发展会使他们贬值。他这样说：

“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得到片面的发展，……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预备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获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335—336页）

所以，这些新的结构倾向打了折扣，因为马克思含蓄地认为第一种图式是有决定性作用的。然而，为什么那“外壳”一定会炸毁就不清楚了。正如保罗·斯威齐写道：“在真正的意

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对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可能性的否定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肯定。但是他的作品中没有地方能找到资本主义生产特殊的经济崩溃的理论。”而且，随着斯威齐的进一步评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包括罗莎·卢森堡和亨利克·格罗斯曼）竭力提出这样一种必要的崩溃，那就没有说服力了。

关于历史证据，由于马克思表明利润率的下降并无内在倾向，国家能干预和缓和（即便不是阻止）经济危机，以及技术已成为资本再投资的一个公开方面，因此他在第一种图式中提出的倾向已经有了修改（即便不说是误用）。并没有证据（在理论上或经验现实中）说明资本主义一定会由于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而崩溃。

那么，旧社会内部的“新社会”结构（劳动力性质的改变，经理的作用）怎么样呢？我称之为第二种图式的社会发展怎么样呢？这些因素在马克思以来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进化的概念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人们读到 20 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他们就会见到：事实上，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

后马克思主义：西方的对话

论述资本主义的作家们中，没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这个名词在 19 世纪形成时所带有的自觉含义本身（关于它主要同社会主义理论家相联系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使人认为资本主义只是经济社会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并料想它会很快被后续的某种集体主义经济制度所取代。（事实上，在种种预测它会夭折的情况下，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说明的话，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长命问题。）

最先设法把资本主义转变列为某种不同质的社会阶段的作者——实际上最先把资本主义列为经济史和分析的中心内容的——是德国的经济史学家沃纳·松巴特。松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该书最后修订版以三卷集发表于 1921 至 1927 年之间），设法写一部关于经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经济这个前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解体的完整历史。虽然他充分讨论了技术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一种突出的社